

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的疆域与族群问题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中，疆域与族群问题称得上是其中的重头戏

王坤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综观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广大疆域的形成以及多元族群的整合，既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中，疆域与族群问题称得上是其中的重头戏。

一的范围越到后来越为广大，秦汉国家的统一形态也正是建基在周文明的基础上。关于三代时期的疆域拓展与族群整合，其可注意者，大略有三端。其一，“禹迹”空间的形成。早期中国，自龙山时代众邦林立进入夏、商、周三代时期的广域王国，体现在疆域方面，首要的变化即是文献中所说的“禹迹”空间的形成。“禹迹”空间的形成也成为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禹迹”之说以夏王国的建立为史事背景，在西周时期已广泛流行，在《诗经》《尚书》等传世文献及两周青铜器铭文中留下了多种记述。由现有的史料来看，“禹迹”之说既不是出自后世别人的想法，而不仅仅是一种早期的人文地理空间规划，而是有关早期广域国家疆域及其治理的一种记述，是三代王国广域国家建立的反映，同时具有政治、宗教、地理等多种层面的内涵。

传统的“禹迹”经过战国学者的改编，突出其政治管理及贡赋征收等层面的内涵，过去或认为其所反映了战国时期渴望国家一统的政治观念。现在来看，这类看法有其局限性。类似的说法或观念，在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已有出现。这也反映了政治与疆域一统的局面与观念在西周乃至更早的时期已经出现，并非一定要晚到战国时期。再例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竹简《容成氏》一篇中记载的“九州”说与传世文献并无不同，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差异。如果简单地视之为虚构，则很难解释同一主题的不同构之间怎有如此大的差异。而上古时期，同一历史事件经历长时间的流传而产生不同的文献记载，在早期文献形成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故“九州”说并非虚构或想象，作为对早期广域国家形成的一种表述，其应有真实发生的史事作为依托。可见，由历史事件的发生到历史叙述的形成，其间经历

了比较复杂的过程，并不能简单地以古史伪造而轻易地加以贬斥。其二，是中心邦对次级邦的整合。三代之初的区域整合尚属初级，三代国家所统治的地域并不密实，其中往往存在一些隙地。三代王国虽已由龙山时代末期万邦林立的状况进至统一的王权，在愈益广大的地域内建立了统治，但其统治还比较粗疏，其疆域内外仍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尚未整合进统一王国政治体系的族邦势力。另外，位处边缘的统治区域也常会根据王国兴衰的实际形势而发生变化。鉴于这种情况，三代国家形成了一种“中心邦—服属邦”的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王朝时期，夏、商、周邦先后成为中心邦，其他地方上的族邦则是服务于中心邦的次级邦，与中心邦一起形成广土众民的王国。如此在“禹迹”空间形成的基础之上，三代王国中心邦对其他次级族邦的附属与整合构成了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正是通过对次级族邦的整合，三代王国的疆域得以不断拓展，疆域内部的空间地带也持续得到填充，王国的疆域形态更加向密化发展。

中心邦对次级邦的整合，通常借助于礼制的推广。礼虽有多层次属性，但从功用的角度来说，其在制度层面的属性发展得最为充分，也最为后人所重视。三代国家时期，在政治治理方面尚未完全建立官僚制度，并不存在像后世那样比较明确、系统的各项规章制度，而是更多地依据长期形成的禁忌或传统。当时政治统治与社会运转所依据的礼，实质就是经过规范或改造的传统习俗，诸如与政治有关的分封、册命、朝觐、军事征伐等，都有复杂的礼仪环节要遵循。在夏、商、周三代时期，中心邦与次级邦之间的日常交往依礼制而行，其上下关系也是依礼制进行协调与巩固。

其三，三代王国对边域族群的整

合。夏、商、周三代虽崛起于不同地区，但三代统治的核心区域基本上全属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核心区持续发展的同时，在中原周边的边域地带，王权的威灵鞭长莫及，逐渐形成了以“夷”“戎”等为称的边域族群。三代国家建立之后，往往即向四方边域拓展，《诗经·大雅·棫朴》中讲：“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说到周王勤勉以治理四方疆域，并非纯是套语，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种事实。由商至西周，中心王朝对边域族群的治理与整合渐有制度化的趋势。例如，殷商时期已经出现“侯”，在西周时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设置。西周王朝在形势复杂的边域地区广泛分封侯、伯等贵族势力，以控制当地的土著族群，周王朝分封所及之地即受周的治理并成为周的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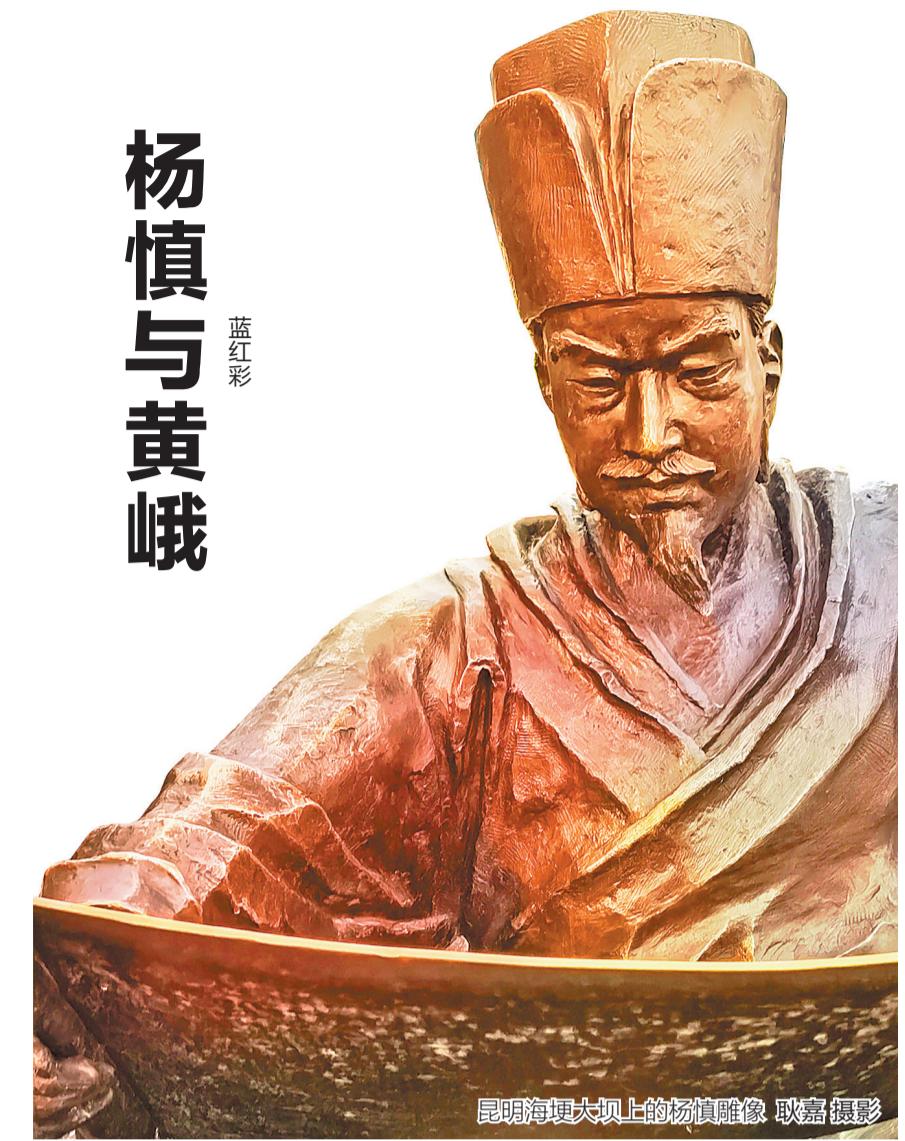
三代国家对边域族群的整合，其过程历时久远，具体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上的关键的一段。综观三代时期的历史，早期王国虽然偶有向西、向北拓展的行动，但主要的拓展方向仍是向东至大海、向南至长江流域，乃至长江以南部分区域。三代王国对边域族群的整合构成了早期国家疆域发展的又一阶段。经由对边域族群的吸收与整合，三代政权的统治由黄河中下游核心区逐渐向东方、南方、北方等拓展，将江汉、淮水流域、山东半岛东部等地区纳入了王国的疆域范围。

区域间的整合与族群间的融合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线索。疆域由小渐大，族群由微而巨，这一发展趋势与特点在华夏文明史的开端阶段已尽显无遗。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区域与族群之间互联互通，经由河流、道路乃至无形的文化传递逐渐铸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的文明共同体。

(作者系吉林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杨慎与黄峨

蓝红彩



昆明海埂大坝上的杨慎雕像 耿嘉摄影

杨慎，字用修，初号月溪、升庵，又号逸史氏、博南山人、滇南戍史、金马碧鸡老兵等，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明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书法家。杨慎出生于官宦书香之家，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三叔杨廷仪俱中进士。杨廷和还是武宗、世宗两朝首辅，杨慎20岁应四川乡试，擢易魁。24岁举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任经筵讲官。明嘉靖三年（1524年），杨慎因“议大礼”事件，两被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市），从此僻居云南35年。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病逝于昆明高峣寓所。在云南期间，他设馆讲学，游历考察，广收学子，著书立说，是明正德、嘉靖两朝的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

黄峨是杨慎次妻，才貌俱佳，博通经史，工于诗文，擅长诗词曲。后世名家评价说：“才艺冠女班”，才情甚富，不让易安、淑贞。”夫人篇什，云蒸霞蔚”。著有《杨状元妻诗集》《杨夫人词曲》等。黄峨不但才名出众，而且在杨慎流放云南永昌卫期间，悉心照顾公婆，极为孝顺，得到时人称颂。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黄峨出生在四川遂宁官宦人家。其父黄珂，历任农阳（今湖南汉寿县）知县，因精勤吏治，擢升御史，在京供职。其母聂氏，知书识礼，严于家教。黄峨幼年聪明伶俐，在其母的教导下，好学上进，书法琴艺精通，诗文曲词当行。

明正德九年（1514年），黄峨已到适婚年龄，她向其父表明心迹，要选像杨慎那样学识渊博，志趣高尚的人做郎君。后来，黄珂辞官携带家眷回到老家遂宁。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杨慎以养病为由，回到四川新都。不久，其夫人王安人病故。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杨慎续娶黄峨，被当地人赞誉为“尚书女儿知府妹，宰相媳妇状元妻”。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黄峨陪同杨慎到京城复职。黄峨在京城官邸操持家务，夫妻二人生活惬意。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明武宗病逝，由其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即嘉靖明世宗。嘉靖皇帝登位不久，他要把已故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杗）尊为“皇考”，享祀太庙。以杨廷和为首的朝臣认为与《皇明祖训》的礼法相悖，竭力反对。嘉靖三年，世宗下诏尊亡父为“恭穆皇帝”，朝臣群情激愤。杨慎率撼门哭谏，两次遭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

黄峨得知杨慎流放云南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她匆忙收拾行装，带着仆人，随丈夫登舟南下，誓与丈夫同生死共患难。黄峨与杨慎一行入扬州、进南京，南

爨文化时期滇东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这一时期的汉夷融合、夷夷融合，对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重要作用

杨黔云 钱润光



爨龙颜碑保存于陆良县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

纵观学者们对爨文化的认识可知，爨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爨文化约始于公元三四世纪晋晋时期，终于八世纪唐天宝年间，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其中心区域在今云南省曲靖、昆明、玉溪、楚雄、红河等地，范围包括当时的建宁、兴古、朱提、云南、祥河、越巂、永昌七郡在内的整个南中地区。由于爨文化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所处的位置是西南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域，因此，爨文化既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又有显著的土著部落文化表现，是一种多元文化复合体，在西南地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上具有代表性。

从学者们对爨氏入滇到爨氏后裔的发展考证中，可以看出滇东、滇中等地民族融合发展的轨迹。根据《新唐书·南蛮传》《通志·氏族略》《汉书》《爨龙颜碑》《两爨世家》等资料研究，认为“爨氏乃楚令尹子文之后”“食采于爨，运迁南土”。另外，有以官职为氏的爨祖国魏将爨襄，其后人南来入滇有爨习和爨遐两支：爨习在东汉末为益州牧刘璋建伶县令，其先祖是东汉后期来滇戍屯的长吏；爨遐在魏景元四年灭蜀汉时“左迁”南中的说法。爨氏进入南中后，“始显于蜀汉，强盛于晋代，直至唐天宝五年被南诏爨氏所灭，拥有700年的历史。爨氏作为南中大姓之一，同时推动着南中地区汉民族的夷化过程和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融合成一个叫作爨人的民族集团。”(简启贤《从爨人方音特点看爨氏家世》)从爨氏入滇的强盛至衰落轨迹中可以看出，来源于中原核心地区的爨氏明显带有中原文化的属性，之后到巴蜀，受巴蜀文化影响，

再后来迁至云南，与云南夷文化融合。就此而言，爨氏入南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过程。

爨文化时期的民族融合，最突出的表现是南北朝后期开始见于文献记载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等新型民族群体的形成。这是南北朝晚期至唐中叶分布于南中腹地的两大主体民族。《蛮书》记载“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在石城、昆川、曲躬、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升麻州，南至步头，谓之东爨”。由此可知，东、西爨主要分布在滇东、滇中地区，交叉而居。关于“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的概念，据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尤中考证：“白蛮”是秦汉以来僰族与汉族人口相互融合而形成的，“白”与“僰”是同音字。”社会科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大概接近汉文化（或文化较高）的称白蛮，其余称乌蛮。”学者们对“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各持观点，但从民族融合的角度讲，“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汉民族和其他民族融合，以及其他民族间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具体说，是当时以“昆明”“叟（僰）”为主的“羌戎之民”和以“濮僚”“滇僰”“邛僰”为主的“魋结之民”的融合。

南诏国崛起后，民族融合持续并有所深入。《蛮书》卷四载：“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言语不通，多散居林谷，故得不徙。”据学者们考证，迁徙到滇西的爨氏后人，在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其子孙仍姓爨，到元代，爨化为寸。在今保山、大理、腾冲等地都有寸姓，包含在汉族、白族、彝族等民族中，

这应该是后来民族融合的结果。

根据相关文献典籍、碑刻、墓穴考古等研究，爨文化时期滇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表现在方方面面，涉及这一区域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等。在政治上，爨氏对王朝实行的是郡县制，受王朝册封或委任，代表王朝实行统治权，但是与爨区各民族、各部族之间实行的是姻亲制，且各部族之间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特殊的社会治理组织系统决定了当时的爨区既不是完全的独立王国，也不是实实在在的地方行政区划。经济上农畜并存，以农为主，以畜为辅，这反映了当时结合自然环境，把中原农耕文化与本地山地畜牧文化相结合的经济生产方式。

文化风俗是爨文化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现形式。“遑耶”作为一种婚姻习俗，是爨文化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表现。《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曰‘自有耶’。”“遑耶”即古夷语“姻家”“亲家”的意思，是当时南中大姓与夷上层联姻的婚姻习俗，其目的是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政治联盟。这种婚姻习俗持续若干代后逐步形成具体的，是当时以“昆明”“叟（僰）”为主的“羌戎之民”和以“濮僚”“滇僰”“邛僰”为主的“魋结之民”的融合。

爨文化是爨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蛮书》卷一载：“俗尚巫鬼，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每岁户出一牛或一羊，就其家祭之，送鬼迎鬼必有兵……”在历史上，有爨氏作为大鬼主的记载，在《南诏德化碑》中有“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大鬼主爨崇道”的记载。这种普遍的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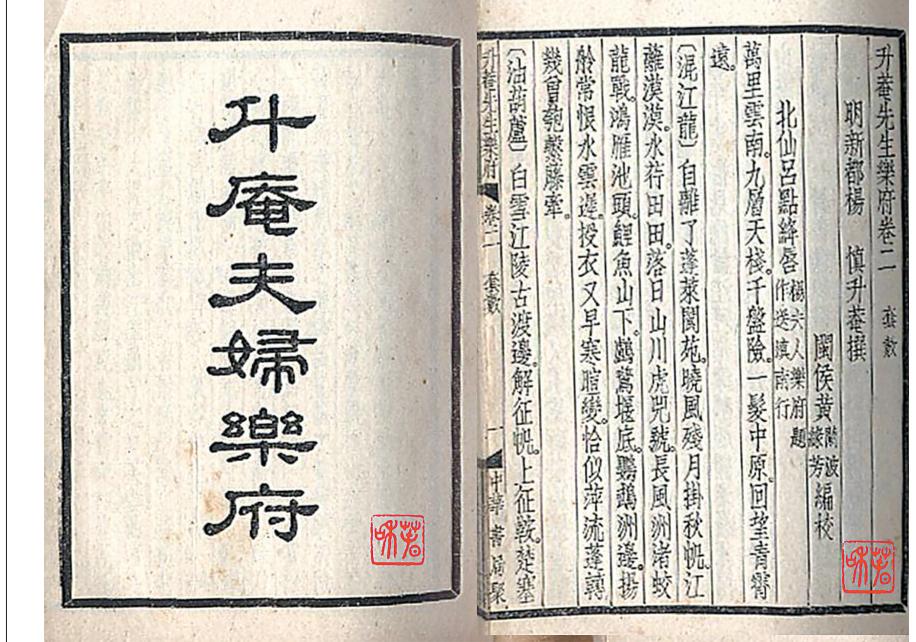
鬼信仰是当时南中汉人为适应当地夷人风俗而融入的。尤中在《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中说：“（爨氏）则作为地方统治者的同时，又兼‘大鬼主’‘鬼主’，即同样信仰僰语中的巫鬼教，吸收僰语中的宗教文化，也仍然使用汉文化而保持汉文化。”“鬼主”文化既是一种文化风俗的表现，又是一种政治特征，是爨氏统治南中地区的一种手段。

碑刻文化是文化融合的另一种重要体现。以《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以及大理《寸氏墓碑志》和成都《大唐故东爨府君墓志铭》等为代表的墓碑，一方面记载了爨文化时期汉夷文化融合的轨迹；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汉夷文化融合的表现。云南史学专家鲁刚认为：两爨碑为爨文化时期的南中地方民族统治集团爨氏家族的遗物，既是汉晋之世汉文化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与长期积淀的结晶，又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汉夷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鲁刚《爨文化特色新探》)对于爨碑的汉夷文化融合表现，秦齐认为，举世闻名的“两爨碑”无论是行文风格、职官题名，还是碑的形制，以及大爨碑碑额的饰物朱雀、玄武、穿耳等都有明显的汉文化特征。

(张一丹《楷隶相间的“二爨”》)

爨文化时期滇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表现十分丰富，这一时期的汉夷融合、夷夷融合，对后来西南民族融合及西南民族与中央政府关系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系分别系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曲靖师范学院党委统战部部长)



合编杨慎黄峨夫妇词作的《升菴夫妇乐府》书影